

《柳如是别传》 与 国 学 研 究

纪念陈寅恪教授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柳如是别传》 与国学研究

纪念陈寅恪教授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中山大学历史系编 主编：胡守为



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巧丽

封面设计:郦文龙

《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

中山大学历史系编

主编 胡守为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杭州大众美术印刷厂印刷
(杭州谢村电厂路)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5 插页 5 字数 20.4 万 印数 2501—7500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213—01272—X/K · 339 定价:12.80 元

陈寅恪教授是一位对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卓越学者。他在宗教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语言学、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古典文学和史学方法等领域的杰出研究,具有开拓和奠基的意义,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陈寅恪先生学识渊博,为人正直,具有崇高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始终保持一个知识分子不与时逐,不为己谋,襟怀坦白,虚怀若谷的情操,其道德文章一直是后辈学者学习的典范。我们深感珍贵并引以为荣的是,从1949年至1969年,陈先生有20年的时间在我校(包括前岭南大学)历史系任教。在此期间,除了指导学生和助手外,他完成了《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寒柳堂集》、《柳如是别传》等不朽的著作,修订了《金明馆丛稿》等作品,奠定了我校中国中古史研究的学术基础。中山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传统和学术特色的形成,正是陈寅恪教授等一大批前辈学者长期辛勤耕耘的结果。

这次会议是在中山大学举行的第二次以纪念陈寅恪教授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今年恰好是陈寅恪教授的著作《柳如是别传》成书30周年,本届讨论会重点研讨“《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传统”,更具有特别的意义。可以想见,通过认真而热烈地讨论,求同存异,我们对陈寅恪先生的学术思想,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巨大贡献,将有更广泛、深入的认识。这次讨论会对于中山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也将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山大学校长曾汉民教授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致辞

代 前 言

——关于陈寅恪先生

胡宇为

在《〈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付梓之际，浙江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嘱我为陈寅恪先生作一简介，以便读者对陈先生有所了解。我想陈先生早已扬名海内外，学术界都很熟悉，毋庸赘言。然而近年来陈先生的著作在坊间已不易得见，年轻学子或非专攻文史的人，对陈先生可能有陌生之感，故不避画蛇添足之讥，略书数言，特别有关陈先生的文化史观与《柳如是别传》的关系，陈述鄙见，仅供参考而已。

陈寅恪先生(1890—1969)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陈宝箴，光绪年间官至湖南巡抚。父陈三立，近代著名诗人。兄陈师曾，近代著名画家。陈先生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打下了深厚的文史基础，并从家族中继承了民族自尊意识，这对他一生有着重要的影响。加以他天资聪颖，学习勤奋，其成就更超出众人之上。

稍长，他游学欧美，在著名学府如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哈佛大学、柏林大学学习社会科学，特别专攻比较语言学。在此期间他掌握了多种语言，包括梵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蒙文、满文等古代文字，这就使他具备了极为丰富的语言知识，又广开视野。19世纪的欧洲，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都有很大发展，陈先生在欧洲学习，广泛阅读各家之说，包括马克思的《资本论》，无疑对他的学术成长产生了影响。

当陈寅恪先生在欧洲的时候，哈佛大学有意聘请他担任教席，

陈先生婉言谢绝了。可是不久清华国学研究院邀他当导师，尽管他还想在柏林大学多读一些国内缺乏的资料，但仍于1925年毅然回国应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人同为当时清华四位著名导师。此后，陈先生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香港大学、燕京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校担任教职，培养了一大批后来在学术界知名的专家。他又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陈寅恪先生回国后，先讲授佛经翻译文学等课程，同时发表多篇关于佛教以及边疆民族史的论文。他说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唐史和中古民族文化史。在三四十年代，他的主要著作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很有价值的论点。他的两部专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被称为隋唐史研究的里程碑之作，英国享有盛誉的唐史专家崔瑞德(D. Twitchett)说，他主编的《剑桥中国隋唐史》每一章节，都得益于陈寅恪先生的研究成果。此外，陈先生又倡导以诗文证史，在史料学中开拓了一新领域，《元白诗笺证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是陈先生晚年的主要著作。《论再生缘》除考证作者陈端生的生平外，并对弹词体和陈端生的思想有不少精辟的论述。从1954年至“文化大革命”前夕，在这10年中，除一度因跌跤住院治疗外，陈先生几乎每日都在写作《柳如是别传》。这部皇皇80余万言巨著，虽以名妓柳如是为线索，却论述了明清之际的重大事件，引用大量诗文材料，考释入微，有很多地方发前人所未发，应是陈先生的学术结晶。

“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之可望，辙迹之可寻。”这是陈寅恪先生对王国维先生的学术评价，很多学者认为用在他本人身上也是非常恰当的。以我现在的学识对陈先生的学术作全面准确的介绍，实难胜任，此处我只就陈先生关于文化问题，谈一些意见。

陈先生说：“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陈先生的中国中古史论

著,有关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甚多,所谓“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是他认为中国中古史最重要者即民族与文化两因素。唐代的最高统治阶层,实出于形成于北周的关陇集团,此集团乃一以关陇地域为本位的胡汉混合体,其所推行的政策即所谓“关中本位政策”,他以此剖析北周隋唐史事,已为国内外学者所信服,被誉为不易之论。而“关中本位政策”实以关陇为文化本位,借用周官旧文,以适应鲜卑习俗,藉此笼络人心,便可知文化问题在我国中古史上其地位实不容忽视。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中,开章明义指出:“种族文化问题为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藩镇是中唐以后最严重的问题,他又说:“论唐代河北藩镇问题,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民族、文化问题既为中古史的两个重要因素,两者的关系又如何呢?陈先生在论北朝胡汉问题时说:“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所谓有教无类者是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两者相较,陈先生认为文化尤其重要,而且民族之间的调和,文化又占主导地位,他说:“精神文化方面尤为融合复杂民族之要道,”(《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即是此理。

汉魏以降,门阀政治居统治地位,士族固属地主阶级,而庶族亦非全是贫苦大众,士庶之分主要区别何在?陈先生认为:“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又说:“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士庶的分野,文化是主要因素,其影响甚至超出民族意识,陈先生曾举北魏的崔浩为例,“浩事拓跋珪、嗣、焘三世,竭智尽忠,而甚鄙非文化高门之刘宋,盖由社会阶级之意识,超出胡汉民族之意识。”(《崔浩与寇谦之》)陈先生在其著作中使用阶级一词,往往如同今日阶层的概念。崔浩家族于鲜卑族入主中原之时,没有南渡江东投附非文化高门之刘宋,其主因是仍企图在中原维持士

族政治的统治，不惜与出身汉族寒门的刘宋对抗，这就是“社会阶级之意识超出民族之意识”，也是文化因素起了重要作用。陈先生论述文化的作用时，并没有以为文化高超于一切，他仍认为文化“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王观堂先生挽词序》）这段话表述了他对文化问题总的观点，与文化决定论仍有区别。现在从文化论史者已很普遍，而昔年风行从政治论史之时，陈先生的研究成果，实转移了一时的风气。

什么是中国文化？陈先生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 Idea 者。”（《王观堂先生挽词序》）当今对文化所作的定义甚多，陈先生将中国文化之定义定于三纲六纪的理想境界，即以伦理道德为文化的集中表现，以此为准则支配人们的行为和思想。《白虎通》之纲纪亦即儒家之纲纪，两千年来虽不无变迁，然其核心却仍深扎于中国人民之间，外来文化必须经受检验，或融合，或排斥。譬如佛教，陈先生指出：“释迦之教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决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道教也不例外，“至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亦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陈先生说：“此种思想上之态度，自六朝时亦已如此。”由此陈先生得出一重要结论：“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归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所谓

“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即以本民族的文化为根本，外来文化必须经过吸收改造，融于一体，才能有重大久远的影响，既不排除外，又非全盘接受。此论与中体西用之说也有别，因为陈先生是从本质论文化的融合，比体用之说更深一层，而与今日强调要有中国特色的道理应是一致的。他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一文中，以语言为例，指斥《马氏文通》强以印欧语系的文法规律为汉语言文法规律，说：“夫印欧系语文之规律，未尝不间有可供中国之文法作参考及采用者”，但是“其他属于某种语言之特性者，若亦同视为天经地义，金科玉律，按条逐句，一一施诸不同系之汉文，有不合者，即指为不通。呜呼！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又说：“由是言之，从事比较语言之学，必具一历史观念，而具有历史观念者，必不能认贼作父，自乱其宗统也。”陈先生于此再强调关于文化“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基本原则。陈先生所以反复论述此原则，其意义绝不限于学术范畴。

1931年，在清华大学20周年纪念时，陈先生著文对当时国文教学“皆不求通解及剖析吾民族所承受文化之内容”，表示不满，又指出文化上的一些弊端，然后大声疾呼道：“此重公案，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便可见他把文化与民族精神紧密相连，将文化兴衰视同民族精神生死大事，这就是他注重维护本民族文化地位的根本原因。陈先生曾赠北京大学1929年级历史系毕业生一首诗：“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参浦江清《清华园日记》）从学术交流的角度而言，到日本受中国历史自无可，但发展为“群趋”便是以东邻为主了，这就使国中士大夫“羞欲死”，他训勉青年学子要洗雪斯耻，以维护民族自尊精神。他把文化与民族精神连在一起，这也是一例。

1929年，王国维先生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关于王先生的死因，社会上诸多猜测，陈先生力纠众说，以王先生为一文化精神凝

聚之人求其解,他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其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又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王观堂先生挽词序》)由此可见,所谓“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实系文化、人格、国家民族于一身,生死与共,他在《挽王静安先生》诗中有“文化神州丧一身”句,即是此义。陈先生在纪念王国维先生的碑铭中,特别表彰他学术上独立自由的精神。他所谓独立自由,意即不受俗谛所囿,坚持学术己见,着意于创新,王先生是为其理想文化而献身的人。陈先生的《王观堂先生挽词》,文辞工整,含义深挚,曾传颂一时,不但显示其国学功力深厚,又可见他于王先生“风义平生”的情感。陈先生一生奉行独立自由精神,尽管他与王先生的文化观不无差异,两人同属“文化凝聚之人”则无疑。

明清递嬗,不但政治变革,社会也因之而变动。柳如是生长于此时,初则为婢,又流落为娼,却得周游于名士之间,其举止行为往往为当时妇女所不及。如明南都倾覆,柳如是劝其夫钱谦益死,谦益不死,柳如是便欲自沉,因被阻而未果。及后,又积极致力于复明运动。陈先生在《柳如是别传·缘起》中说:“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柳如是致力于复明运动,其思想行为当合乎儒家三纲六纪之义,即维护民族文化精神,而此种精神又是陈先生一贯倡导的,这恐是他穷十年之力为此“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作长传的主因。书中议论与情感交融,又足以说明这一点。揣测而已,尚希方家指教。

1994年9月在中山大学举行了“《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传

统”学术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学者就陈寅恪先生一生最大也是他最后的一部著作《柳如是别传》，从创作的动机、主题思想、史实的创见、研究的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探讨。目前对《柳如是别传》专门研究的著作还不多，这次讨论会除了对这部著作作全面的评价外，又从这部著作剖析陈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研究的方法。陈寅恪先生在学术界有崇高的地位，他的成就无疑是后学者应继承的珍贵遗产，本文集是根据这个宗旨汇集此次讨论会的报告和论文而成。附录一篇会议纪要，可了解此次会议的概况。与会学者在会后修改了其报告、论文，有的学者因故未能出席会议，也把文稿寄来；季羨林先生为本集题写书名；浙江人民出版社为出版本集给予很大支持；中山大学历史系校友邱锦荣先生又慷慨赞助本集出版；在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1995年3月于广州

目 录

代前言

——关于陈寅恪先生…………… 胡守为(1)

陈寅恪先生的爱国主义…………… 季羨林(1)

我所了解的陈寅恪先生…………… 周一良(8)

陈寅恪先生与民族文化史之研究 …… 赵令扬(16)

《柳如是别传》读后 …… 胡守为(23)

学习《柳如是别传》的一点体会

——柳如是的民族气节 …… 王永兴(28)

“颂红妆”颂 …… 蔡鸿生(35)

《柳如是别传》的人物评价 …… 刘健明(43)

从寅公《柳如是别传》看河东君与陈子龙之交 …… 马楚坚(69)

陈寅恪先生与心史研究

——读《柳如是别传》…………… 姜伯勤(92)

《陈寅恪诗集》中的悲观主义色彩浅释…………… 李 坚(103)

“移情”与史学研究之境界

——读《柳如是别传》…………… 刘志伟 陈春声(121)

读《柳如是别传》…………… 卞孝萱(128)

从《柳如是别传》探研陈老的诗证史…………… 邓 瑞(145)

《柳如是别传》与诠释学…………… 李玉梅(163)

略论《柳如是别传》的研究方法·····	李龙潜(180)
《柳如是别传》与中国古代姓氏制度·····	张荣芳 王 川(186)
陈子龙的词和他的词论	
——读陈寅恪教授《柳如是别传》感念而作·····	邱世友(203)
钱柳论衡	
——《柳如是别传》读后·····	谭世宝(232)
试论陈寅恪与傅斯年思想之异同·····	马亮宽(240)
纪念陈寅恪教授学术讨论会纪要·····	陈树良(255)

陈寅恪先生的爱国主义

北京大学教授 季羨林

陈寅恪先生的一家是爱国之家，从祖父陈宝箴先生、其父散原老人到陈先生都是爱国的，第四代流求、美延和他们的下一代，我想也是爱国的。当年英法联军攻进北京，火烧圆明园，当时陈宝箴先生在城里，看到火光，痛哭流涕。大家都知道，散原老人实际上是因日本侵略中国才拒绝服药、拒绝吃饭而去世的。那么，陈先生的爱国主义表现在什么地方？我想就这个题目，谈点我个人的看法，这里面牵涉到《柳如是别传》。

爱国主义是一个很好的词，大家一听爱国主义，都是不会批判的，因为每个民族都有权力爱自己的国家。爱国主义，词是个好词，可是我就考虑这又和我们市场上的货物一样，有真货，有假货，有冒牌的。我以为爱国主义应该区分两种：一种真正的，一种假冒伪劣的。这个区别并不难。大家知道，日本侵略中国，中国人，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要抗日的。这个大家没有否定。那么日本人也高呼爱国主义，东条英机也高呼爱国，但是把中国的爱国主义与日本的爱国主义一对比，中间的区别是很大的。因此我就想，真正的爱国主义是正义的爱国主义，应该是这么一个样子：它不允许别的民族侵略自己，这是一；第二，也不侵略别的民族。因此，我认为真正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是相联系的。假的爱国主义就是侵略别人、压迫别人，然后反而高呼爱国。我这里举的是以日本军国主义为例，要再举的话也容易：希特勒就是。希特勒的爱国主义也喊得雷一般响，但却对别的国家发起了闪电战。他爱什么国呢？他

爱他的法西斯国家，侵略别人，压迫别人，奴役别人。所以爱国主义应该分成这么两种，其道理是比較容易懂的。这真正的爱国主义呢？就是我刚才讲的陈宝箴先生、散原老人、陈寅恪先生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抵抗外寇，不允许别的民族侵略自己，是正义的。后来我又想这个问题，恐怕正义的爱国主义又应当分为两个层次：一般人，我们中国受别人侵略，我们起来反抗，爱我们的国家，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歌颂的、赞扬的。但我觉得这种爱国主义是一般的，层次不高；层次更高的是与文化联系起来。我想陈先生所撰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序》，大家都看过，序很短，可是道理很深刻。怎么说呢，王静安先生与陈先生的岁数虽有差别、环境也不一样，可是两个人的关系真是心心相印、息息相关，“心有灵犀一点通”。诗中讲：“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从中可以知道，当年陈先生与王观堂先生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寒夜中谈论过去的事，所以两人相对流泪，两人的感情是完全一致的。为什么？我今天想解释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高层次的爱国主义。陈先生的这段挽词同在清华立的王观堂纪念碑上的碑文（也出自陈先生之手）内容差不多。碑文也很短，讲的问题就是众所周知的中国文化。我们高喊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大家各自的看法可能不尽一致，我自己感觉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个表现就是爱国主义。这一点我在北京已经讲过，可能有些同志不同意我的看法。我的看法也不是瞎想的。我不专门搞哲学，严格讲也不专门搞历史。但是喜欢胡思乱想。我想中国的爱国主义者，像中国汉朝的苏武、宋朝的岳飞及文天祥、明代的戚继光、史可法等都是我们熟悉的，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汉至清有一系列爱国主义人物，深入人心。这种情况在别的国家很少见，我在欧洲呆了好多年，因此了解一点，欧洲如举一个著名的爱国者就不好举，什么原因呢？原因很简单，这是由我们中国的历史所决定的。中国这个国家非常奇怪，立国几千年，按道理讲，我们

这样一个国家，在封建社会，那个天子、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只允许侵略别人，不允许别人侵略，应该能够这么讲。可事实并不是这样子，大家都知道，从先秦的周代等时期开始，中国就被当时称为“蛮夷戎狄”的少数民族侵扰；秦朝，秦始皇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为了抵御北方的匈奴，他主持修筑长城。当然长城并不是秦始皇时代才修筑的，在战国时期就修了。长城的修筑，有效地抵御了匈奴的侵扰。到了汉代，开国之主刘邦也被匈奴包围于平城；后来汉武帝时几员著名大将，跟匈奴作战，打了几个胜仗。可无论如何，北方的威胁却始终没有解除。曹操时，北方威胁仍存；到了五胡乱华时代则更不必说了。唐朝是一个了不起的朝代，唐太宗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却对突厥秘密称臣。后来，唐太宗觉得称臣于突厥不大光彩，想方设法掩盖这个事实。整个唐代，北方的威胁一直没有解除。到了宋朝那就更清楚了，先是辽，后来是金。两个北宋皇帝徽宗、钦宗让人俘虏，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后来宋廷偏安于中国东南一隅。到了元朝，其统治民族蒙古族是我们今天的兄弟民族，在当时不能这样看。蒙古在大宋以前，已经建成了一个大帝帝国。我们不能把古代现代化。中华民族这个包括 56 个民族的大家庭，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明确形成的。到清朝，满族今天也是我们的兄弟民族，当时满族的文化与我们不一样，当然，满族一入关就汉化，可毕竟是另一个文化体系。

总而言之，我认为中国之所以产生爱国主义，就因为有外敌，而且一直没有间断，原来一直在北方，后来是东方，主要是倭寇，西方最早的是明朝末年从澳门进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后来成了帝国主义。还有南方。东西南北都有外敌。我们讲历史唯物主义，要讲事实，存在决定意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然产生爱国主义，而这种爱国主义必然是正确的。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中国封建社会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没有侵略别人，这话是不对的。封建时代的国家，汉族也侵略了别的不少民族，这是不能否定的。可总起

来的话，是御外敌的。这是历史决定的，不是中华民族天生就爱国，这也不符合历史情况。欧洲则不是这种情况，欧洲长期是乱七八糟的，建国时间又短。美国的情况更特殊，它建国以来，基本上没有外敌，所以美国讲爱国主义，我不知道怎么爱法。这是我信口谈来。由此，我就想到陈先生在给王观堂所撰的挽词前的短序中讲了这么一个想法：中华文化是三纲六纪。据我的体会，里面就包括了爱国主义精神。如“君为臣纲”，说君臣这一纲，陈先生举了一个例子，“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意思就是，人君的贤与否，无关重要。他只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他象征的是文化，象征的是国家。陈先生又讲，三纲六纪是抽象理想。文化是抽象的，抽象的东西必然有所寄托，陈先生原文作“依托”。一个是依托者，一个是被依托者。作为文化的三纲六纪是抽象的，抽象的本身表现不出来，它必然要依托它物，依托什么东西呢？陈先生讲的是社会制度，特别是经济制度，总起来就是国家。文化必然依托国家，然后才能表现，依托者没有所依托者不能表现，因此，文化与国家成为了同义词。再回过头来，王国维先生之所以自杀，当时外面议论很多，陈寅恪先生认为他不是为了具体的人，不是忠于清王室或宣统皇帝，认为他忠于清朝或宣统皇帝不过是流俗之见。王国维先生之所以执意自杀，就是因为他是这个文化所化之人，文化本身有一个依托——国，以王国维先生而言，这个依托就是清朝。所以，清朝是他的文化理想的依托者。清朝灭亡，这个国家不能存在了，按陈先生之意，所依托者一旦不能存在，文化也不能存在。那么，为这个文化所化之人也必然不能存在。所以，陈先生认为王静安先生之所以自杀是因为他所依托的那个国不能存在了，具体的东西不存在了，抽象的文化也无法依存，于是执意自杀。

那么，陈先生为什么与王国维先生心心相通？陈先生为什么写《柳如是别传》？这就是我的解释。中国外来文化，第一个是佛教，佛教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不依靠武力而传播到中国的；后来元朝